

#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孙敬之

## 一 新中国人口问题产生的由来

我们并不讳言我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口问题，因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所以要彻底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旧中国开始。

大家知道，旧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新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和束缚，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连年不止的军阀混战，人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疫病疾病，逃荒乞讨，卖儿卖女，这就是旧中国常见的一幅饥民图。

那时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完全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人口变动的情景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十分缓慢的特点。1936年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11.3‰，若从鸦片战争算起，直到解放前夕，109年时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于此。1840年中国估计人口有41281万人，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增加到54877万人，百余年间仅增加33%，每年人口增长仅为2.6%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组织农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收了官僚资本的企业，建立了国营经济，还进行了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2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国民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1953年6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

这一次人口统计清楚告诉我们，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国人口变动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特点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促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如此迅速的提高呢？

1)由于全国解放，社会生活安定，我国人民在经过几十年战争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局面。

2)由于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了，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

3)由于人们生活的普遍改善和提高，许多过去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的人家都结婚成家 and 生孩子了。而且农业等生产部门，仍以体力劳动为主，在客观上有多生孩子的需求。

4)由于五十年代避孕药具尚未被广大人民所知，人们还无法不要不想生的孩子。

5)当时我们所施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如按人口分配口粮，分配住房，分配定量供应物品等，对因多子女而经济困难者给予补助等，客观上也助长了人口的增加。

6)由于几千年传统的宗法思想的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等封建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还严重存在。这种习惯势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怎样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模式的这个重大变化，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在若干年后它将对我国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会带来些什么问题?对此我们尚没有经验,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有两个情况更加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盲目乐观情绪:

其一是,当时(五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我国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和顺利,生活资料的增长,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所以这一矛盾并未表面化和突出。

其二是,在理论上,盲目地,不加批判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地增长,并断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不会出现人口问题。

但是,对于人口增殖太快势将引起的不良后果,在我国并不是没有人预见到的。在我国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就曾著文指出:如不及时采取对策,势将造成潜在的失业人口,并将影响国民经济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将阻挠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实现。

1957年马寅初先生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他从实地调查我国经济情况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就是要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

但遗憾的是,这些中肯的意见当时并未被我国学术界所接受,反而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被当做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毒箭而大遭挞伐。

在批判过程中,在我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人手论”,这种理论认为:革命成功后,产生人口问题的原因便消除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不能只看到人有一张嘴,更必须看到人还有一双手,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就越发展,积累也就越快。结论是人口越多越好。尽管这种理论和我国现实是完全相矛盾的,但是它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直到整个六十年代,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在这个期间,人口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理论禁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口方面的问题,未能深入研究,许多很好意见未能采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人口增殖方面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而且政策的某些方面,客观上还起着鼓励人口增长的作用。

1958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迭遭波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下,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而恰恰在这二十年里,我国人口却以很高速度在发展,并出现过几次人口增长的高峰。特别是1954—57年,1962—71年,每年出生人口比通常年分多出数百万乃至上千万。1978年我国总人口高达95,809万人(不包括台湾,如加台湾省为97,523万人),也就是说,从1949—1978的三十年间我国净增了四亿多人口。

人口过快的增长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许多困难。

首先,它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中所增长的物质财富很大一第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吞没了。如我国的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二千多亿斤增加到目前的六千多亿斤,但由于同期人口从五亿多增加到九亿多,所以每人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实际增加并不算多(从1950年的每人平均479斤增加到1976年的614斤)。

其次,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由五十年代的二亿多增加到目前的三亿多,而我国的耕地面积却由解放初期的16亿亩减少到现在的15亿多亩,有不少地方农业劳动力已超过农业生产本身的需要。

第三,由于人口增长过速,使得目前适龄青少年的升学、就业问题显得非常紧张。全国历年积累下来的待业人口多达二千万,也大大超过了目前可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由于我们国

家底子薄，教育经费有限，因此适龄青少年中能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只占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

第四，人口增加过快，影响国家建设的积累。在我国九亿人口当中，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将近一半，这些人口是纯消费人口，国家、集体和家庭除供给他们衣食住外，还要负担他们的教育费用，这笔开支数目是相当庞大的。

第五，人口增长过快，还对交通运输，住房，日用品供应等造成严重影响，目前这些方面供应紧张，不能不说人口增加过快是一方面的原因。

由上述可见，我国人口问题之所以严重到今天这样程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模式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发展规律缺乏了解，没有采取相应对策，以调整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而造成的。因此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我认为必须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必须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特点，走中国式的道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得到最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必须提倡计划生育，大大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此同时大力提高我国人口质量，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干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认识并掌握了人口规律，因势利导，采取相应措施，我们是一定能够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的。我们的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社会制度本身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强大力量。

## 二 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大力推广计划生育。

经过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盲目增长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对于应该下大力气控制人口增长，以期求得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在认识上基本趋于一致了。

现在，我们对于恩格斯如下几段话，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理解。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的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恩全集、第四卷第2页）

“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一点”。（马恩全集，第35卷，第145—146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增加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马恩全集，第35卷，第145页）。

从恩格斯的这几段话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教益呢？

（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的，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不论人们对它认识与否，不论是自发调节还是计划调节，它们二者之间必然力求达到某种平衡，而任何对这一平衡的破坏，必然导致社会停滞和倒退。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表现为迅速增长，也就是说，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是社会主义人口的发展规律。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增长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并不是通过单纯增加劳动力数量来实现

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增长并不要求人口与之相应成比例的增长。而相反，由于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所需劳动力的数量反而会减少些。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劳动力的质量，却提出了日益更高的要求。

(三) 马尔萨斯虽是节制生育的倡导者，但他的理论的要害并不在于节制生育，而在于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把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归诸于人口迅速增长，从而掩盖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实质。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而断定马克思反对节制生育，甚至认为马克思是“众民主义”者，是主张人口漫无限制增加的人。从上述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就予见到在将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为人口数量的增长规定一个限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远见卓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口增长的实践，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究竟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表述它最为恰当。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从事人口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最根本要求，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一致，人口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必须受国民经济计划调节，以期作到：1)总人口的增长尽可能与同期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2)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必须与同期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3)人口的增长要同教育、卫生、住宅等公用事业的发展相适应；(4)人口在质量上的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技术熟练程度，体质状况等)应能满足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等等。

对人口实行计划调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这是因为：(1)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每个公民都在某一种形式的公有制(全民或集体)之下劳动和工作，因而生儿育女不再单纯是个人的家庭私事，新增人口的抚养、教育和就业都和全社会息息相关，它已成为全社会性的事业的一部分了。(2)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全民利益，拥有多种宣传手段、经济措施、行政立法措施，可以对人口的增长状况，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强有力的教育和调节；(3)现代医学的发展，各种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为计划生育，为主要是通过调整出生率的办法来调节人口自然增长率提供了实际的可能。(4)中国人民是有较高觉悟的，当他们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和国家要求时，大多数人是能响应政府号召，而有计划的生育子女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增长，可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况：

当劳动力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时，人口就要施行扩大再生产。

当劳动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需要时，人口就要施行简单再生产。

当劳动力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需要时，人口就要施行缩小再生产。

应当说，这三种情况都是符合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的。其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满足国民经济对劳动力资源所提出的量和质的要求。这就是人口数量、质量要和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相适应。

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我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远远超过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此，我国人口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行计划生育，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我国自七十年代提倡计划生育以来，已取得很大成绩，目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从20%左右降到11.66%以内，低于1979年全世界平均自然增长率17%的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权衡各方面利弊的基础上，确定一个长远的人口发展目标，然后进一步降低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最近我国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未来若干年内我国人口增长的各种模式，使我们可以比较更精确地来研究未来人口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可以选择一个恰当的人口发展目标。见下表。

方 案	从 1980 年开始每个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	到 2000 年时人口数	达到最高值年份	人 口 数	到 2080 年人口数
I	3 (1975 年水平)	14.14 亿	—		42.6 亿
II	2.3 (1978 年水平)	12.82 亿	—		21.19 亿
III	2	12.17 亿	2052 年	15.39 亿	14.72 亿
IV	1.5	11.25 亿	2027 年	11.72 亿	7.77 亿
V	从现在起逐年降低至 1985 年降为 1.		2004 年	10.54 亿	3.7 亿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前三种方案对我们当前情况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前两种方案是人口持续增长的方案，第三方案人口还要再增加 72 年才达到最高峰值，对我们说来时间太长了，而且人口还要再增加 5.8 亿。

第四种方案怎样呢？这一方案显示，在平均生育率为 1.5 的情况下，我国总人口在今后 47 年里还要持续增长，这种状况对于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但从政治方面考虑，从群众接受能力方面考虑，也应予以注意。

如果采取第五种方案，提倡和鼓励育龄妇女一胎生育，那么到下世纪初（24 年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便可降到零，且总人口不超过 11 亿，随后将出现人口减少趋向。那时我们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改变人口政策（当然政策改变应在二十年之前）。

因此，我们可以说，去年我国政府提出的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是有科学根据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它可以大大削弱这次人口高峰对下一次“高峰时期”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冲击。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目前当务之急是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下来。这是从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措施，当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之后，我们再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使人口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因此，我们不能把有计划控制人口片面地理解为减少人口，把一个时期内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简单理解为永远不变的政策。这样作，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老年人比例逐渐增大的情况，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口年龄构成轻的特点，在短期内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人口政策，把人口老龄化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根据计算表明，从现在开始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到 2004 年左右，就可把人口最高峰值限制在 10.54 亿，到 2060 年就能进入平稳状态，总人口将在 8.3 亿左右。（这一数字合理否，待研究）在这一期间，老年人所占比重在 2020 年为 13.3%，2030 年为 17.8%，2040 年为 23.3%，2050 年为 19.5%，2060 年为 14.3%，之后随着人口政策的适当调整，老年人口的比例，还可进一步下降，并稳定在 10% 以下。

### 三 大力发展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生产力布局，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根本途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除实行计划生育，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外，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我国国民经济。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作为我们在本世纪为之奋斗的一项根本任务。在此之后，又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方针。

所谓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从我国国情的具体实际出发，就是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特点，因此我们的四化不能照抄外国现成的经验。

现在，我想就我国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与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 （一）调整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

首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把轻工业的发展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因为轻工业主要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资料，它的发展不仅对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有很大意义，同时轻工业一般有机机构成较低，具有投资少，收效快，并且可以容纳更多人口就业特点。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上欠帐较多，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今后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其次，在技术的引进上，应适应我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应首先发展那些能够迅速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的新技术，而对那种提高产量不多，但能节约劳力，减轻强度的新技术，暂时可放在稍次地位。

第三 适应我国耕地少、人口多特点，在今后农业发展上，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充分发挥精耕细作的特点，农业机械化也必须适应这个特点，多在水利、化肥、良种、土壤改良等方面下功夫。

第四 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林牧副渔、各种有传统有特色的手工业、都应因地制宜地发展，这方面容纳人口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

第五，在城乡大办集体生活服务事业，既能广开就业门路，又能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的多种需要，少花钱多办事，一举数得。

第六，在东南沿海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创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引进外资和设备搞补偿贸易，利用我们劳动力充裕的特点。总之，要“扬长避短”在发挥优势上多下功夫。

#### （二）合理规划我国城市，按照大中小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发展中小城镇

城市化是当前世界普遍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工业在城市以比农业生产快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就象磁石一样把其吸引力所及地区的人口吸引到它的周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农业由于机械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断腾出多余的劳动力，发展工业或进入城市，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工业的普遍的分布农村也逐渐城市化。这个过程目前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进行着，发展趋势是一切农村将逐渐变成为城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根据联合国 1979 年统计，目前世界城市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 39%，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 68%，发展中国家占 28%。从国家来看，城市比重比较高的国家有：西德（92%）、

东德(76%)、英国(83%)、澳大利亚(86%)、新西兰(81%)、比利时(95%)、阿根廷(80%)、美国(74%)、法国(71%)、加拿大(76%)、苏联(62%)。

我国城市人口据 1978 年底统计约为 1.2 亿(不包括台湾省), 占总人口的 12.5%。在世界上算是城市人口比重较低的国家之列。

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 必然会从农业中解脱出大批劳动力, 由于我们农业人口基数大, 即使从农村解脱一半, 也就会有 3—4 亿人口。如何为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找到妥善的出路, 是我们当前必须预见到的一个重大的人口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虽然不大, 但目前一些大中城市都有人满之患, 主付食供应, 住房, 交通均十分紧张, 再增人口已相当困难, 何况将来需要重新安置的人口数量是如此庞大, 因此依靠现有大中城市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唯一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遍发展社队企业, 普遍发展中小城镇。变多余劳运力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我们设想, 现在全国共有 2000 多个县, 如果每个县有五个公社所在地发展成为小城镇, 全国就可出现一万个小镇, 如果一个小城镇以二万人口计算, 就可以吸收二亿多人口。如果这些小城镇在实现四化过程中, 逐步发展到五万人的规模, 那么就会容纳五亿多人口。根据调查, 一个小城镇的经济联系半径大约为 10—15 公里。如果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万多个小城镇, 那么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除西部人烟稀少地区和少数山区以外, 就都可以纳入到这些小城镇经济网之内了。这些小城镇将逐步成为该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研中心和文娱活动中心。这将会为大批劳动力找到妥善的出路, 使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 农村优势将为城市优势所代替, 农村生活方式将为城镇的生活方式所代替, 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将在国民经济普遍高涨中逐步缩小。

(三) 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向边疆移民, 开发边疆是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

目前我国人口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就是人口分布不均匀。概括地计算, 我国东、南部沿海各省土地面积约占全国 40%, 而人口占总人口的 90% 以上, 西北、东北、西南部各省, 土地面积约占 60%, 人口还不到全国总人数的 10%。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100 人, 如以每平方公里 30 人的低标准估计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省(区) 的移民容纳量, 则大约可达一亿以上。因此, 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适当移民(包括省内向边缘地区、山区的适当移民) 将是势所必行。它不仅将作为减缓东部地区过密人口压力的措施, 而且对于开发我国西部地区的天然富源, 充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劳运资源, 对于繁荣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对于高速度的平衡的发展生产, 对于巩固国防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然, 以上只是一个极粗略笼统的计算, 至于各个省区究能容纳多少人口, 还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地区自然资源和土地丰饶的程度, 开发的难易, 交通便利的程度, 以及国民经济在当前这一时期内给它提出多少建设任务等等因素, 而决不是说马上就可把上述人口通通移往西部各省。不过以上所述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的概念, 即我国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 容纳人口的潜力很大, 这是肯定无疑的。

在移民的方法和步骤上, 我们决不能沿用过去那种强制性、奴役性和盲目性的人口流动

和移民。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移民也必须严格按国家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秩序地进行。解放后 30 年来我们曾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今后的移民工作开展得更好。

#### (四)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口的生活方式

我国目前还是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许多地区自然经济还占颇大的比重，地区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的文化水平还很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社会保险事业不发达，老年人的大多数还需要由子女来赡养，再加上某些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还很深，上述一切都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有所反映。这也是我国人口增长率比较高的一个现实基础。

所谓生活方式这里主要指的是劳动人口于劳动时间外的业余时间的多少及其活动内容的构成状况。一定的生活方式首先总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当然它又是与一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程度等分不开的，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最基本的经济上的原因）。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不断地在更新的水平上结合的结果。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这一结合主要表现在劳动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劳动时间较长上。在这种条件下，它一方面要求人口数量的不断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它又决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去做文化、体育等活动，以改进人口质量，而这必然又会影响到人口行为，促进人口数量的增殖。这正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期间所历经的情况，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并开始发展民族经济后所感受到的情况。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对发展中国家说是在六十一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和维持较长的劳动时间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条件下它一方面不需要人口与生产的发展保持同一速度，而是要求普遍地提高人口质量（体质与科学文化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为缩短劳动时间、延长业余时间提供了可能，为建立和扩大提高人口质量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设施创造了条件。我们看到这正是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情况，在那里近一百年来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增加了二至三倍，而劳动时间由于实行五天工作周、七小时工作制以及假日等而缩短，甚至少于业余时间总量。劳动者把自己的业余时间以及经济支出越来越多地用到通过进修和培训来提高个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广泛利用大众媒介和从事创造、体育及文娱活动上，以适应现代生产和现代化社会的需要，而这也影响到人口行为，促使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低。

在我国，随着四化建设的开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今后劳动人口的业余时间还会逐步增加，业余活动的构成也会不断扩大和丰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消极地等待。恰恰相反，我们完全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政治觉悟，不断地引导人们去为实现四化而合理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把精力主要放在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修养、文化技术水平和增强体质上。同时，还要在生产发展的同时，逐步扩大和完善人们为合理利用业余时间所必须的社会和个人（家庭）的物质基础——即为满足文化、教育、科学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各项设施和手段（尤其是在乡村）。这样，既能为四化建设培养高质量的劳动人口，又能从一个方面促进我国人口增长率降低，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更快地适应起来。当然，要想彻底改变我国人口的生活方式还须依赖于四个现代化的完成。（本文由郭振淮、魏津生二同志整理 1980.5.）